

宋代「三元」问题研究

杨高凡——著

SONGDAI SANRONG
WENTI YANJIU

人 民 大 版 社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

杨高凡——著



责任编辑:刘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杨高凡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 - 7 - 01 - 019122 - 5

I . ①宋… II . ①杨… III . ①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宋代 IV . ①D691.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5001 号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

SONGDAI SANRONG WENTI YANJIU

杨高凡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4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122 - 5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宋代「三冗」问题研究

本书得到河南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建设经费资助



宋代『三元』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 / 刘 畅
封面设计 / 姚 菲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宋代“三冗”问题概述	21
第一节 宋代冗兵问题及其表现	21
第二节 宋代冗费问题及其表现	31
第三节 宋代冗官问题及其表现	45
第二章 宋代冗兵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57
第一节 宋代冗兵的形成过程	57
第二节 宋代冗兵成因	74
第三章 宋代冗费及其相关问题	121
第一节 宋代冗费的形成过程	122
第二节 宋代的冗兵与冗官之费	129
第三节 宋代的郊祀冗费	143
第四节 宋代大兴土木之冗费	160
第五节 宋代的公使冗费	173
第六节 宋代冗费之成因	203
第四章 宋代冗官及其相关问题	215
第一节 宋代冗官的形成过程	215
第二节 宋代冗官的构成与表现	222
第三节 宋代冗官的成因	235

第五章 宋人对“三冗”问题及应对措施的讨论	245
第一节 包拯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245
第二节 蔡襄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261
第三节 黄震对三冗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270
第六章 宋代三冗问题的历史教训	285
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11

绪 论

“三冗”概指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的冗官、冗兵和冗费现象，其中冗官表现为机构性“冗官”、人员性“冗官”、财政性“冗官”和效率低下的事务性“冗官”；“冗兵”指的是宋代军队“数额猥多，冗而不精”和“不任征战，坐而冗食”；“冗费”是指冗军、冗官之费，以及奢靡祭祀、大兴土木等过度财政支出。“三冗”是宋朝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领域。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视为宋代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及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终极根源。许多有关“三冗”问题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定论。毋庸置疑，宋代的确存在“三冗”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给当时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不过，我们不应该将其绝对化。“冗”其实是一种相对而言的说法，无论是冗官、冗兵还是冗费，都是相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存在“冗”？“冗”到什么程度？恐怕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另外，在讨论“三冗”问题时，不应仅局限于宋朝，而是应当放在历史时空中进行纵横比较，不仅要以汉唐明清时期为参照系，更要考虑两宋政权周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比如就“冗兵”而言，仅就文献记载及宋人的议论看，的确到北宋中期军队人数激增，出现了冗滥的现象，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辽、西夏及西南、东南等少数民族政权给北宋王朝造成巨大国防压力、延绵数千里的边防线及有效控制几千万人口所需要的庞大武装力量，则区区百万军队能称得上是“冗兵”吗？何况其中还有近半数兵额是不需要战斗的劳役性部队。因此，对于这个似乎已经没有讨论余地的老话题，如果换一种思路，还是可以做进一步探索研究的。

“三冗”问题是宋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学术问题。宋朝“三冗”问题很突出、很复杂，涉及面很宽，触及层次很深，既有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特有的重大层面上的问题，又有“唐宋变革”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共性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地梳理这一课题，既是宋朝“三冗”问题本身研究的需

要,又是推动宋史纵深研究的需要。“三冗”问题是宋史学界一个“老话题”,但又是久而未决的“老问题”。宋人与当今学术界对其多有所论及,但至今为止尚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也未厘清其概念内涵成因、影响等诸多问题,对这样一个老话题、老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反思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冗”作为宋代研究中的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凡研究宋史者,自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对此均有不同程度论及,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既有从整体上讨论“三冗”的,也有对冗官、冗兵、冗费做专题研究者。这些研究成果对三冗的成因、表现、具体内容及影响等均有涉及,下面将分专题加以介绍。

一、关于“三冗”的宏观性研究

“三冗”概念的提出始于宋人,后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持久而热烈。今人对“三冗”的宏观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中的“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一节,单列“宋代之冗兵”和“宋代之冗吏”两目,对宋朝冗兵、冗官进行专题性论述。他所说的冗兵、冗官主要是指宋朝军队和官员数量多、开支大。钱穆的观点继承了宋代士大夫的成说,也是学术界最流行的看法。^① 之后邓广铭先生也在文章中谈到了“三冗”问题,他认为赵匡胤等最高统治者对于经济立法问题缺乏正确认识,故而造成两大弊病——土地兼并严重和“冗兵、冗官、冗费”情况的出现。^② 王恩厚先生在《北宋“三冗”弊政述评》一文中对造成北宋“三冗”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三冗”对宋政府政治、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③ 赵云旗先生也在《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一文中称北宋中叶出现了“三冗三费”问题,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导致了宋王朝“积弱积贫”局面的形成,并指出王安石的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扭转“三冗”造成的贫弱局面。^④ 此后沈松勤先生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中辟专节讨论北宋“三冗”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及其影响,他认为宋初确立的统治方略导致了冗官与冗兵的产生,而冗官、冗兵又是冗费问题的主要根源。他还指出,“三冗”不仅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是导致北宋中期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② 邓广铭:《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 年第 5 期。

③ 王恩厚:《北宋“三冗”弊政述评》,《历史教学》1981 年第 1 期。

④ 赵云旗:《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学术季刊》1999 年第 2 期。

党争激化的主要原因。^① 米玲、崔勇、丁建军在《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一文中指出,宋代财政发达虽十分显著,但“钱荒”“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却贯穿宋代始终,形成巨大反差,文章认为“三冗”问题是使宋代赋税弊政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② 另外林哲敏认为“三冗”现象一直困扰着宋朝,是其积贫积弱、国势不振的主要原因。宋朝曾多次采取包括裁减冗官、冗军和限制费用支出等措施,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③ 张至邈指出北宋统治者希望通过增加官员数量、提高官员待遇、扩大军队数量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但严重的“三冗”问题却威胁到北宋政权的安危,造成“积贫积弱”局面。^④ 以上便是学界关于宋代“三冗”问题的宏观性讨论,不难看出,自钱穆、邓广铭以下的学者基本上在重述前人的观点,即认为宋代“三冗”问题十分突出,直接导致积贫积弱现象的出现。关于“三冗”出现的原因,几乎都认为是宋初政治改革造成的。实际上,由于宋朝“三冗”含义有别、发展过程不同,其成因也是千差万别的,有古代社会共性的原因,也有宋朝时代性原因,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三冗”涉及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时代的推移及人们对于宋代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许多有关“三冗”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二、关于宋代冗官问题的探讨

宋初统治者为了达到分权而治的目的,有意识地重复设官,其所导致的官冗现象一直是史家诟病的主要话题,也被视为宋朝贫弱的根源。因此冗官既是宋代“三冗”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主要的成因,向来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学者们分别对冗官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论述。

一是关于冗官形成的原因。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国史大纲》中就有述及。1979 年,赵永春先生在《试论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也认为宋初统治者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政权”而采取“分散事权”“官职分离”的作法,虽然避免了封建割据的再现,但也导致了冗官增加的现象。因此宋初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是导致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但作者

^①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米玲、崔勇、丁建军:《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河北学刊》2008 年第 6 期。

^③ 林哲敏:《刍议宋朝的“三冗”问题》,《科教文汇》2009 年第 29 期。

^④ 张至邈:《浅析北宋“三冗”现象及其危害》,《新余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也认为,宋初这种冗官现象是受到“一些控制”的、是“促进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只是到了宋真宗以后,这种“弊病”才大大发展了,进而形成了“庞大的冗官滥吏集团”。^① 白元先生在《北宋冗官论》一文中指出,冗官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封建私有制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② 另外覃延欢的《浅谈北宋的冗官》、李广星的《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等文也认为冗官是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北宋尤甚,危害甚烈。^③ 刘笃才、杨一凡《论北宋的冗官问题》一文认为,北宋冗官之所以严重存在,乃是北宋统治者为防止重新出现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君权闇弱以至被取代的危险,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文章最后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冗官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④ 另如姜国华的《试析北宋冗官产生的原因》、王会全的《浅析北宋冗官局面的成因》、刘立夫的《论宋代冗官之成因》、曹福铉的《宋代官员人数的增加及其原因》、张昊的《浅析北宋冗官问题的成因》等文均持此论。^⑤ 换言之,大部分学者将北宋“冗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宋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措施的消极影响。其实宋初推行的一系列集权措施固然是导致官员冗滥的主要原因,而对五代十国旧政权原有官僚队伍的大量接纳、宋初七八十年间随着行政事务的增多,官员人数的自然增加,也是造成官冗的重要原因。

一些学者从入仕途径泛滥的角度来解释冗官出现的原因。对此,学者一般持有两种观点:一是“科举致冗”说。如何忠礼先生在《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是造成冗官冗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宋代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⑥ 游彪先生则从“牒试”制度来考察科举取士对冗官的影响,认为“牒试”制度不仅加剧了两宋时期的冗官危

① 赵永春:《试论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四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② 白元:《北宋冗官论》,《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8期。

③ 覃延欢:《浅谈北宋的冗官》,《学术论坛》1983年第1期;李广星:《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

④ 刘笃才、杨一凡:《论北宋的冗官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5期。

⑤ 姜国华:《试析北宋冗官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1988年第4期;王会全:《浅析北宋冗官局面的成因》,《东疆学刊》1993年第4期;刘立夫:《论宋代冗官之成因》,《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韩]曹福铉:《宋代官员人数的增加及其原因》,《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昊:《浅析北宋冗官问题的成因》,《首都博物馆丛刊》2007年第21期。

⑥ 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机,导致严重的吏治腐败,而且扰乱了科场秩序。^① 二是“恩荫致冗”说。不少学者认为“科举致冗”说过于笼统,宋代科举入仕之人不及入仕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对官冗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何况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大部分是国家可用之才,不能笼统地归为冗官。与科举相比,恩荫制度才是宋代最主要的人仕途径,是产生冗官的真正原因。如前引赵永春的《试论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认为“冗官滥吏”的主要来源就是“科举授官”和“恩荫授官”。很显然,作者认为,科举制度与恩荫制度都是冗官的主要因素。^② 日本学者梅原郁先生分析了宋代恩荫的种类,指出恩荫制度是导致官员冗滥的重要因素。^③ 张希清先生在《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宋代科举取士人数的统计和推算,认为无论是从员多阙少,还是从官员素质来看,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都不是科举取士,而是门荫补官以及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④ 韩国学者裴淑姬先生也认为备受诟病的特奏名考试并非导致冗官问题的主要因素,官冗是由于恩荫太滥所致,“将宋代官冗归至于特奏名取士,并不妥当”。^⑤ 此外,游彪^⑥、白文固^⑦等人也在论著中将荫补入仕视为导致官员冗滥的主要因素,如游彪先生就认为,由于大量官员亲属通过荫补方式成为官僚,从而形成了宋代积重难返的冗官局面。也有学者认为冗官与宋朝任官制度有关,如贾玉英先生认为北宋初年“官与职殊”的差遣制度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她在《试论北宋的官、职、差遣分授制度》一文中通过对北宋官、职、差遣分授制度的探讨,认为该项制度是宋初统治者为稳定政局、加强君主专制等目的在任官制度上采取的措施,是造成冗官的具体原因之一。^⑧ 苗书梅先生则认为差遣制度“本身并不增加官员的总量”,门荫补官太滥才是冗官的主要原因。^⑨

闲官本为宋政府安置冗官的举措之一,但却加重了冗官弊政。如魏天安、刘坤太先生在《宋代闲官制度述略》一文中指出,设置闲官本为宋朝加强中央集权

^① 游彪:《宋代“牒试”制度论考》,《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

^② 赵永春:《试论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四平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日]梅原郁:《宋代的恩荫制度》,《东方学报》1980年。

^④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⑤ [韩]裴淑姬:《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⑥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⑧ 贾玉英:《试论北宋的官、职、差遣分授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⑨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的权宜措施,但闲官数量日增,至南宋中期形成闲官数倍于在任官的奇特现象,冗官问题日益严重。^① 另外刘坤太先生的《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何兆泉先生的《试论宋代添差官制度》均认为添差官制度是宋代冗官的主要表现之一,添差官造成宋代官僚机构的膨胀,加剧了宋代冗官冗费问题。^② 白文固先生认为祠禄制度是北宋冗官滥俸的政治制度发展的产物,至宋徽宗朝步入了冗滥阶段,加深了冗官时弊。^③ 苗书梅先生在《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一书第一章“选官制度”中认为待阙官、添差官、祠禄官等无职事闲散官员食禄而不预政是冗官的突出表现。官员总数的上升造成了“员多阙少”和一大批超编“添差官”和“祠禄官”碌碌无为。她进一步从三方面对此加以论述:一是“官员总数直线上升,遂使‘员多阙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官员‘待阙’现象普遍”;二是“添差阙位日益增加,遂使宋代编外闲官越来越多,添差食禄而不预政”;三是“祠禄官日益增多,众多官员祠禄差遣,无职事而食全禄,积资序”,由此得出宋代的冗官是由选官制度造成的。^④

还有学者从官员的选任制度、磨勘制度及致仕制度出发分析宋朝冗官产生的原因,如景北记先生就认为北宋的官员致仕制度执行不力,是产生冗官的重要原因。^⑤ 邓小南先生认为宋代官员磨勘制度有流于形式之嫌,缺乏有效的竞争淘汰机制,加剧了官员冗滥现象。^⑥ 贾文龙等认为宋代为克服唐末五代县政之弊,使知县一职成为士人升任高职的基层锻炼经历,致使幕职县官人数激增,地方基层官员选任过滥,成为宋代冗官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⑦

二是关于冗官形成的过程。宋朝冗官问题经历了产生、发展、恶化的过程,对此,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如李广星的《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王会全的《浅析北宋冗官局面的成因》、张金岭的《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马玉臣的《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等文认为冗官问题肇始于北宋初年,形成于宋真宗末年,严重于宋仁宗、英宗之际,恶化于北宋末年,而极滥于南宋,

① 魏天安、刘坤太:《宋代闲官制度述略》,《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

② 刘坤太:《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何兆泉:《试论宋代添差官制度》,《前沿》2006年第3期。

③ 白文固:《宋代祠禄制度再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6期。

④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 景北记:《北宋的致仕制度和冗官冗费》,《求是学刊》1984年第4期。

⑥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⑦ 贾文龙、潘丽霞:《宋代县制改良与积困问题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并纵向分析了宋代冗官不同于前代的特性。认为宋代冗官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性”，时间上的不平衡性是指“冗官在不同时期其轻重程度”不同；空间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地域的差异上。^① 曹福铉在《宋代官员人数的增加及其原因》一文中通过对两宋官员数量的系统统计，认为哲宗朝是宋代官员人数增长最猛烈的时期，徽宗朝官员数量达到顶峰，南宋冗官问题则一直比较严重。学界对宋代冗官产生、发展、恶化过程的看法较为客观，符合史实。^②

三是关于冗官影响的研究。冗官对宋代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危害，其中学界最为关注的是由冗官引起的“积贫积弱”的问题。钱穆、漆侠、赵永春、杨果、李广星、汪圣铎、赵云旗、文畅平等学者均论及冗官与宋代“积贫积弱”的关系。^③ 其中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第一章第一节中指出：“积贫包括着两个含义，就是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民贫）。”认为正是冗官冗兵造成了宋代“积贫积弱”的局势。近 20 年来一些学者对宋朝的综合国力给予肯定，质疑“积贫积弱”说，并由此否认冗官冗兵必然导致“积贫积弱”的成说。如秦国利在《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一文中指出：“宋代有较高的稳定的财政收入，不可谓‘贫’；即使需要支付百万军队和超过万名官员的费用，财政并无出现枯竭的现象，也没有因财政赤字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崩溃，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积贫’，所谓冗兵冗员导致‘积贫积弱’的逻辑关系实难成立。”否认冗官冗兵与宋代“积贫积弱”的逻辑关系。^④ 另有学者认为，正是严重而持续的冗官问题导致宋朝政治腐败、剥削加重，进而加速了国家衰亡的过程。如覃延欢的《浅谈北宋的冗官》、李敏红的《北宋的“冗官”形成与国家“积弱”而亡》、张

^① 李广星：《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王会全：《浅析北宋冗官局面的成因》，《东疆学刊》1993年第4期；张金岭：《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马玉臣：《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韩]曹福铉：《宋代官员人数的增加及其原因》，《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赵永春：《试论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四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杨果：《略论北宋的“冗官”与积弱积贫的关系》，《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4期；李广星：《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 1995 年版；赵云旗：《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学术季刊》1999年第2期；文畅平：《宋代“冗官”现象的形成及其影响》，《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④ 秦国利：《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金岭的《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张昊的《浅析北宋冗官问题的成因》等文章均认为冗官酿成了吏治腐败,加重了财政危机,导致宋朝危机四伏直至灭亡的悲剧。^① 苗书梅也认为由于冗官的大量存在,造成宋代地方官任期短,给当地政治经济带来极大危害。^②

综上,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宋代冗官的表现、成因及影响。认为宋代冗官问题表现为官多阙少与官员数额的恶性膨胀;在论其成因时,大多又将其归结于宋代科举取士或恩荫入仕的泛滥上;在论述冗官的影响时,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惜夸大其弊端。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做了反思性的探讨,认为宋代冗官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郭正忠的《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膨胀规律及根源——兼析两宋官冗的社会背景》一文对中国古代官僚增长速度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冗官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而宋代官吏冗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归根到底是秦汉以来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发展演化的产物,不能完全归因于宋初的政治改革。^③ 吴以宁在《人浮政滥的宋代官制》一文中提出应将宋代官制中人浮政滥的现象放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去加以考察,而“不能以社会分工的细密,不问青红皂白地扣上机构重迭的帽子,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④ 李裕民在《宋代冗官问题新论》一文中认为冗官问题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否认和贬斥。宋代增多的官员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因行政事务需要而设,一类与行政事务的需要无关,而两类官员的设立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⑤ 马玉臣在《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⑥一文中主张不应孤立地看待冗官问题,认为“冗官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共性问题,并非宋代特有现象;讨论宋代冗官问题时,应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去把握;宋代冗官突出表现于‘地狭官多’与‘民稀官稠’上;宋代冗官相对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宋变革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直接原因在于‘易进而难退’的

^① 覃延欢:《浅谈北宋的冗官》,《学术论坛》1983年第1期;李敏红:《北宋的“冗官”形成与国家“积弱”而亡》,《文史春秋》2007年第10期;张金岭:《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张昊:《浅析北宋冗官问题的成因》,《首都博物馆丛刊》2007年第21期。

^② 苗书梅:《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

^③ 郭正忠:《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膨胀规律及根源——兼析两宋官冗的社会背景》,《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④ 吴以宁:《人浮政滥的宋代官制》,《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

^⑤ 李裕民:《宋代冗官问题新论》,《宋史考论》,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马玉臣:《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养官’体制；宋代冗官影响，表现于多方面，但各朝情况又不尽相同，应区别对待”^①。剖析可谓一语中的，全面精准。

三、关于宋代冗兵问题的研究

学界关于宋代冗兵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冗兵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冗兵形成原因的讨论。宋代兵多而战斗力不强，对外战争屡屡失利，却要负担巨额军费，历来被认为是兵冗不精，冗兵问题十分突出。关于宋代出现冗兵现象的具体原因，学者多有不同见解。部分学者认为北宋初年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冗兵形成的根本原因。如袁征的《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一文通过对宋太祖、太宗两朝驭将政策的比较研究，认为宋太宗“肇启了宋代冗兵的弊端”，进而认为：“宋朝冗兵和‘积弱’的严重问题，主要就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发展造成的。”^②葛金芳则从集权政治的视角出发，指出冗兵的形成与官僚机构膨胀、专制皇权强化、力役激增、厢军扩充及财政困窘密切相关。^③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北宋实行的募兵制及特殊的“养兵政策”是导致冗兵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如邓广铭、王曾瑜、张德宗、程民生、汪圣铎、周銮书等先生均认为宋代募兵制形成冗兵、骄兵局面，对国家经济、政治产生不良影响。其中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募兵制的主要弊端，是维持了一支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宋朝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要“养活几十万至百余万的军人，另加几百万的军人家属”。王先生特别强调，宋朝常备军多而滥的流弊“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见得是封建时代实行募兵制必不可免的通病”。周銮书先生认为，宋朝养兵之费约占财政收入的70%至80%，养兵政策维护了中央集权，也导致国家“积贫积弱”。^④此外，马玉臣、杨高凡在《“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一文中指出，

^① 马玉臣：《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袁征：《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 葛金芳：《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④ 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中华书局2011年版；张德宗：《北宋的养兵政策》，《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程民生：《论北宋骄兵的特点及影响》，《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矛盾》，《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周銮书：《宋代养兵政策剖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